

# 对话过去、当下、未来：口述<sup>(1)</sup>与历史\*

A Dialogue and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Tomorrow

文 黎煜 /Text/Li Yu

**提要：**本文试图借用巴赫金文艺美学的对话理论与卡尔的历史学观点，考察口述历史作为对话史料，对于历史的贡献。笔者倾向于如下定义口述历史：由采访人与受访人通过现场平等对话的形式，共同完成“当下”与“过去”、“未来”的精神碰撞，并由声像设备记录下来史料。其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口述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为历史撰写提供多声部的想象力。

**关键词：**口述历史 史料 历史 历史撰写 对话 独白 过去 当下 现在 未来

在谈论口述与历史的关系前，我们先回到原点，即什么是口述历史？什么是历史？两者在哪个区域发生联系？

首先明确一点，口述本身并非历史。其原因就如同记忆不是历史一般，“就像过去并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目标一样，记忆也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目标之一，也是历史制作的初始步骤”。<sup>(2)</sup>口述是唤醒记忆的一种方法，记忆是通向过去的幽径，口述以记忆为媒与历史发生媾接。在未来，某年某月某日的一次口述采访会成为被视作一起历史事件，在那时，口述才会变成历史事件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指出，“历史”一词包含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sup>(3)</sup>为便于本文进行概念区分，文中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统称为“历史事件”，将历史学家在著述中的记录统称为“历史撰写”，将两者的结合及更广泛的含义统称为“历史”。

本文旨在以卡尔那句里程碑式的口号——“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sup>(4)</sup>——为理论支点，用“对话”的交互特征，考察口述与史料、口述与历史、口述与历史撰写之间的关系。

## 口述与史料

口述历史的概念比较多义，有时被看作一种访谈方法，有时被认作一种史观，有时被视作史料。<sup>(5)</sup>鉴于口述将成为历史撰写的资料，进入历史的原料场，我们采取自下而上的目光，认为口述首先是史料——以录音录像为载体的口语史料。

历史撰写与历史事件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治史者无法直接进入历史事件之中，除非他是事件的在场者。史料充当了两条平行线的桥梁，就像英文字母H中的横线。口述便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是受访人、采访人、撰史者、阅史者回溯历史事件的通道，是众人进入历史的途径。

历史事件一旦被语言表述，便无法逃脱受蒙蔽、歪曲、筛选、变形的命运。史料在传输过程中亦无

法逃避衰减、变异等因素干扰。撰史者将本来就变形的原料再次进行主观清理与表述，经过以上三面镜子各自吸光反射后，被呈现的历史永远无法映照出它的原貌。历史就是这样被定义——“历史是过去，是现在，是世间的这或那，是真相的敌人，是政治有意操作的产物。”<sup>(6)</sup>

历史永远无法终极还原。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朝着真相努力，史料因此具有决定性作用。梁启超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与其它史料相比，口述历史有什么特征？我们如何对它进行识别？

史料有两种分类方式：以原始程度为据，分原始史料与二手史料，口述历史无疑属于原始史料；按载体形式，史料可分为非语言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语史料。建筑、墓穴、遗物、遗迹、壁画、碑文、家具、衣物、器皿、工艺品、墓葬、化石等不以语言为载体（或不主要以语言为载体）的实物属于非语言史料或实物史料。甲骨文、书简、碑文、壁书、通信、日记、文件、书籍、各种印刷品、宣传册、公司账目、统计数据、机构档案、文学作品等借助书面语言保存的史料属于书面文献。口头传述、电台播音、访谈节目、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文件属于口语史料。

一种通行的方式是将口述历史归类在口语史料中。那么，怎么样区分远古的口头传述与口述历史？怎样区分电台电视台的采访与口述历史？怎样区分个人录音文件与口述历史？既有的定义伴随着大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口述历史研究”（批准号09BC031）阶段性成果。

(1) 为避免重复，本文将口述历史简称为口述。

(2) [法]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3) [英]约翰·托什(John Tosh)《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xviii页。

(4) [英]卡尔(E. H. Carr)《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5页。

(5) 边静《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杂谈》，《当代电影》2011年第7期，第82页。

(6) 同(2)，第2页。

的解释。

唐纳德·里奇试图从全景角度，给出定义——“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者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sup>(7)</sup>在此，口述历史的限制性条件至少有五个：内容为记忆和个人观点；形式为访谈；主体为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和受访者；载体为录音或者录像；存贮在专业档案机构。凭借是否经由对话而来，他将窃听录音、演讲录音、个人录音日记等排除在口述历史范畴之外。这一评判标准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然而，他将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排斥在口述历史之外，原因仅仅是它们不保存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sup>(8)</sup>这样的解释未免单薄。

陈墨做了进一步积极探索。他将口述分为广义、狭义，广义包含所有访谈性对话，狭义则将非专业、非学术目的访谈排除在外。人民性、专业性、规范性作为界定广义、狭义的标准。人民性是将口述作为一种史观，专业性与规范性谈及的是对采访者的要求。文章后半部分引入罗纳德·格雷尔“会话叙事”的概念，创造性提出“心灵考古”，指出，狭义口述史学是“建立在会话叙事形式的心灵考古”。文中对“心灵考古”情有独钟，对“会话叙事”言之寥寥。这两个概念皆充满玄机，更适合于个性理解。<sup>(9)</sup>

口述与其他口头史料之间还是有些瓜葛不清，是否能够找到一种试剂，明确分离出口述历史？

如果继续沉陷于将之作为口语史料中的一类来剥离其他，恐怕我们不会比上述两位大师更接近隧洞的尽头。不如我们索性推翻现有史料的分类，大胆从哲学、美学领域引入新的概念，并向历史学推荐新的分类方法。

苏联美学家巴赫金的理论从语言学角度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他将文学作品的言语分为独白与对话，继而将这两个概念推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广义角度理解对话，把它看成不只是人们面对面直接大声的言语交际，而是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sup>(10)</sup>我们不妨借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献按言语的指向分类(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参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

### 1. 独白的史料

独白本是文学作品中人物言语的表现形式之一，即角色的自思、自语等内心活动。在本文，独白泛指一切具有内指特征的言语，其特点是言语主体的表述不传达到听者身上，听者亦没有将自己的思想反馈给讲述者，两人不形成会话交际。这类史料包含绝大部分文献——甲骨文、日记、文件、非对话性质的印刷物、宣传册、公司账簿、统计数据、非

对话性质的机构档案、录音日记、视频日记、网络信息、非访谈类广播电视节目、博客日志、窃听录音、演讲录音、PPT演示等。

有些文献虽然采用对话体表述，比如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死》、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但作者并非还原性记载说话双方的言语，而是将对话的内容进行了主观加工，重新描述，将他人的话语变为自己的话语。在这类作品中，对话只是作者表达自我个人观念的文学形式。所以，它们是独白的文献。

还有一类文献，诗词中的“和”、中国画的“题”、文史作品中的“注疏”，这些对已经存在的文本表达自己观点的言语是否与原作者构成对话了呢？如果“和”、“题”、“注疏”的发出者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原作者，并引发原作者修改原或者再度创作，这当然是对话。但中国文艺传统中大部分的“和”、“题”、“注疏”，都只是单向的表述，囿于时间、地域的间隔，无法与前作者或者后阅者达成双向对话。巴赫金这样定义对话中的问答：“任何回答都要产生新的问题。问与答要求相互的外位性。如果回答自身产生不出新问题，它就会从对话中脱离出来。”<sup>(11)</sup>

### 2. 对话的史料

与独白一样，对话也是文学作品中人物言语的表现形式之一，指角色的交谈、争论等。在本文中，对话泛指一切具有外指特征的言语，即言语主体的表述能够直接传达给听者/阅者，听者/阅者的在场直接影响言语主体的讲述，两人发生会话交际。这类史料包含：通信、对话录、庭审记录、医患问答、电话记录、录音采访、录像采访、社区论坛、网上聊天等。

这样的分类方式将口语与书面语文献重新编队，转而注重语言的内在属性，有利于研究史料与其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构成、个体叙事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新的分类还能够为数字时代的新生儿留出席位。更重要的是，为口述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定义方式。

口述与其他对话史料根本不同的是：它以“当下”的声音，介入对“过去”的探索，预留通往“未来”的路径，穿越三个时间维度。没有哪一类史料，有着如此多向的时间维度。

通信、庭审记录、医患问答、电话记录、社区论坛、网上聊天等，都只是对当下事件和思想的记录，满足当下沟通的需求。电台、报刊、电视台的新闻

(7) [美]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8) 同(7)，第8页。

(9) 陈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当代电影》2010年第3期，第51—58页。

(10) [苏]巴赫金(М.М. Бахтин)《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11) 同(10)，第389页。

采访，与口述根本不同在于是否具备当下的新闻性。张玉法在考察口述新闻与口述历史异同时指出：“口述新闻所述者为新发生的事物，口述历史所述者为过去的事物，通常没有新闻价值。”<sup>(12)</sup>

日益增多的口述类电视栏目、历史类专题纪录片及电影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回忆访谈，是否属于口述历史？它们具有口述的胚胎，却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原因同上，这些采访满足的只是当下节目制作的需求，并未将过去当做一个自足完整的存在。素材带中的采访只涉及节目所需的内容，最终的播出带更是只剩下讲述者的只言片语，访谈片段还被塞入大众传播的通俗叙事模式之中。关锦鹏的影片《阮玲玉》使用了部分访谈资料，这些围绕阮玲玉为题的谈话只能称为采访，自然不是口述。贾樟柯的电影《海上传奇》呈现出对人物讲述完整性的尊重，口述风格十分明显。但，恰恰因为电影“传奇”叙事的要求，一些常态的过去被卡在镜头之外，一些对话的痕迹被抹掉，为了满足传奇叙事的口述形态并不完整。

电台电视台一般性采访只需1—2个小时即可完成，也不需建立友谊关系，在精神和学术投入上与口述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口述历史对一个人的采访往往会花费数十个小时，多则数年，与采访人及其家属关系甚密。唐德刚采访李宗仁就吃了168顿饭，采访长达7年，不仅与李氏夫妇，且与其二子、侄儿“变成挚友，相处无间”，与李家结“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sup>(13)</sup>唐德刚采访胡适，被胡适称作“我的朋友”，除却采访关系外，还“不惮其烦而乐为之使”，充当这位纽约“流亡老辈”的生活帮手。<sup>(14)</sup>

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史料采集方法是一回事吗？不是。陈墨解释，口碑史料的采集人员不专业，目的不单纯，取证不规范，不是独立的历史分支。孔子编《春秋》，司马迁作《史记》，都采用了不少口碑史料，不可谓不专业、不单纯、不规范。同为史料，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最大的区别，还是对话的公允性，即是否将对象当做过去的一个完整呈现。口述对话，是一种交互的、平等的对话。人类学家朱迪斯·莫德尔和摄影师查理·布罗德斯凯认为，口述访谈中的交互式特征在于“会话中特别强调平等交换意见，平等交换意见是后续分析的重要方面”。<sup>(15)</sup>无论是《春秋》、《史记》，围绕电影《武训传》的调查，还是民族志学者搜集口头传述，其目的很明确——为采集者所用。“所谓口碑史料，是指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sup>(16)</sup>这种以使用为目的，它为我用，古为今用，主观取舍的选择性采集方法，显然不符合口述平等对话、完整呈现过去的特性。一不小心，甚至会被某些以我为尊、以今为大、以果及因的史家滥用——“在口头传说中非常常见的情况，便是

利用口述传说的变更来证实当时通行的特定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sup>(17)</sup>抱着政治批判为目的，围绕电影《武训传》的口碑史料调查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 3. 口述作为对话史料

口述历史与上述史料最大的不同，便是对话的平等性。口述的对话，不是简单指作为言语交际行为的会话，也不是作为语言内容的对白，而是特指讲话双方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精神、差殊的文化立场、迥异的身份认同，本着尊重对方记忆完整性的原则，进行跨越“过去——当下”两个时间维度，并为未来预留窗口的精神碰撞。鉴于此，我们与其把口述对话看作一种话语交际行为，一类史料的生成方式，还不如将之视为一个场域，在这里，过去、当下、未来发生某种神秘的联系。

口述往往会选择年事已高的受访者，他（她）能够提供关于过去时代的回忆。采访人一般为后生晚辈，其精神气质、价值观形成与受访者有着代、两代，甚至三代的间隔，或者在地域上有着文化差距。受访人与采访人都能够充分代表过去与采访当下两个不同时期的精神团体，形成“过去——当下”的对话张力。如果口述的史料价值仅仅在于保存记忆，那么它与日记、回忆录并无不同，甚至在文通字顺、篇章华彩上还不如后者。

唯有跨越两个时间维度，通过口述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将对过去的记忆用当下的声音倾诉出来。约翰·托什批评口述历史幻想直接与过去接触，后见之明是其最大阻碍，他以汤普逊所做的“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口述历史为例颠覆其著作《过去的声音》，指出：“‘过去的声音’也必然同时是现在的声音。”<sup>(18)</sup>对于托什的批评，我们不得不说：“完全正确，但是……”，就因为它体现着两种声音，所以历史更加丰富。它恰恰从反方向证明，关于过去的记忆一旦被采访激活，其倾述的内容、表述的形式势必反映着当下的声音。

口述给“过去”与“当下”同时提供对话场域，还虚位以待“未来”落座。规范的口述往往会力图超越本次采访的主题，尽可能地旁及其他。《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指出：“无论计划的特殊兴趣如何，访谈者都必须尝试超越计划的重心，努

(12) 张玉法《新闻与口述历史》，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1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9页。

(14)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5) McMahan, Eva M: 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4. Piv. 转引自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第386页。

(16) 赵兴彬《口碑史料厘定》，《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71页。

(17) 陈献光《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第79页。

(18) 同(3)，第270页。

力扩大询问范围,创造、制作出最完整的记录,以使他人得蒙其益。”<sup>(19)</sup>他人,显然是指未来的文献使用者。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制定规范,让话题超越电影,提出实行“电影史、心灵史、社会史”三史合一的采访要求。<sup>(20)</sup>这些努力的目的在于为未来的电影史撰写提供资料,“且希望能够为未来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明史甚至经济史、城市史、风俗史、社区史、妇女史等不同专业史家提供信息资源”。<sup>(21)</sup>可见,在一次规范的口述采访中,过去、当下、未来缺一不可。

综上,口述历史是具备过去、当下、未来三种时间维度的对话史料。它可以被如此定义:由采访人与受访人通过现场平等对话的形式,共同完成过去、当下、未来的精神碰撞,并由声像设备记录下来的史料。唐德刚也将口述历史首先定义为史料,并将其命名为“活史料”——“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修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sup>(22)</sup>

声像介质并非必要条件,而是辅助手段,比如聋哑人的口述可以由文字书写完成。李镇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中就曾用交换纸条的形式采访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聋人设计师施有成。音像设备的重要性在于,借助它,能保证口语体原样的完整性。同样,口述对话的形式大多为口述,但不限于口语,它可以是哑语、盲文,甚至是书面语。

关于口述的对话特征,罗纳德·格雷尔早在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中,就称口述历史是“会话叙事”。他解释:“考虑到历史访谈者用一系列手势与声响进行着积极参与,也因为口语交流制造的逻辑形态,访谈只能被定义为‘会话叙事’。‘会话’是因为其反映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关系,‘叙事’是因为其展示形式同于故事讲述。”<sup>(23)</sup>该文并未对“会话”与“叙事”的本质展开阐述,而是重点考察在口述历史访谈(即会话叙事)中存在的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将单词组构为句子的语言学分析;第二种是述者与听者面对面的碰撞;第三种是信息发出者与历史学家,信息发出者和他的历史意识之间的碰撞。<sup>(24)</sup>文中主要关注第三种关系,作者认为它可以揭示意识形态、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对话”说对本文启示良多,但“叙事”说值得商榷。从俄国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到法国叙事学大家热奈特,叙事都是指有因果关系的故事讲述。口述言说的特点是有序与无序交织、因果关系与无逻辑混合、闭合性讲述与开放性言说并举,且常常发生由对话断裂引发的意义真空,需要解读者进行情境下解码。如果引入语言学细读,口述对话有时甚至是以一种“反叙事”的面目呈现出来。

口述对历史贡献的多重性令其余史料望其项背。作为史料,它是历史真空有力的填充;作为方法,它让学院派史家投入生机盎然的民众生活;作为史观,它将人民推上历史舞台,改写帝王将相、精英名仕史;作为人文关怀,它让不同阶层的人找到自我价值,使“草根”的人生变得充满自尊。汤普逊将口述与历史的关系描绘为乌托邦般的大同社会——“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构建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而且,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的人来说,由于口述史具有意义共享的特点,所以它在地点和时间上为这些人提供了归属感。总之,它会使人变得更加充实。”<sup>(25)</sup>

关于人民性的大作汗牛充栋,怀旧疗法与共同体建构也不乏著述。何不沿着口述的对话特征,首先探寻其作为史料的本体价值?

将文献资料视作最可靠、最有价值的德国兰克学派曾经在19世纪独领风骚。随着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随着1945年独立后的殖民地撰写历史时越来越多地倚重口述资料,随着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走向田野调查,文献派的治史方式日益遭到冷落。口述能够自立的依据建立在对文献史料可信度的批驳之上,就像汤普逊所嘲讽的那样,“文献学派面临着它自己基础的动摇。因为文献自身已经以两种方式改变了它的社会功能。第一,人们之间的最重要的沟通已经不再通过文件进行,而是口头的了,通过会面或电话。其次,记录已经丧失了它的清白(如果它以前有的话),它现在被理解为有着进行未来宣传的潜在价值”。<sup>(26)</sup>汤普逊继而指出,口述历史纠正了文献史料的偏差,弥补其空缺,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结构。

口述作为史料,对历史的补充体现在四个方面:从立项开始,其价值择定标准就是补正史之不足;受访人名单的圈定亦是力图涵盖各阶层;采访提纲的拟定宗旨是力求纠偏现行说法与关注为正史所忽

(19) 同(7),第263页。

(20) 陈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序》,《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海上影踪:上海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1) 同(9),第54页。

(22)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第219页。

(23) Grele, Ronald J.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Precedent Publishing, Inc. Chicago, Illinois, 1985, P135.

(24) 同(23),第136—141页。

(25) [英]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6) 同(25),第65页。

略的常态生活；采访现场的对话沟通碰撞出新的火花。前三项准备工作最终是为采访文本的有效性服务，因而，我着重以口述对话为蓝本，考察其从史料学角度对历史的功绩。

### 1. 双向双维沟通，打捞被忽略的史实

同属回忆性史料，回忆录与口述历史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是双向交流。以本文标准分类，前者是独白的史料，后者是对话的史料。汤普逊批驳回忆录：“书面的回忆录是一种专门要误导历史学家的口述史形式，并且‘除了了解气氛毫无用处’。它们缺少访谈的某些优点，而又提供不出什么东西作为补偿。作者不能接受盘问，也不能回答在特别感兴趣的要点上的补充问题。印行的自传是一种单向的沟通，他的内容是根据作者头脑中的读者大众口味而确定地选择出来的。”<sup>(27)</sup>

如前所述，口述是由采访人与受访者以对话形式，共同完成过去、当下、未来的精神碰撞。在场谈话的主体有两对，采访人/受访人，过去/当下。后者作为所述内容的精神实体与言说的主体（前者）一样，也在进行自足的对话，使其进入更加开放的历史空间，可以打捞大量被受访人忽略的历史事件。唐德刚提及，在胡适著作中，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的好话，“但是在‘对话’里，他却说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功夫”。<sup>(28)</sup>

同样，以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为例，受访人多年逾八旬，其人生观的形成主要为波诡云谲的40年代与大一统时期的“十七年”。采访人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价值观形成主要受新时期民主精神与后新时期的全球化影响。两个对话主体跨越40年代、“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后新时期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国浓缩了西方数百年的价值观变迁，从民主与民族主义启蒙教育到自觉接受马列毛的文化洗礼，从跪拜“东方红”神话到清醒“太阳”也有陨落时，千疮百孔的精神肉身未及疗伤就投入“新时期”的狂流，精英文化刚刚含苞待放便萧瑟焜黄，全球化与网络时代将没有对接准备的中华价值观推向与世界同步的轨道。这样大的文化差距，使得口述访谈蕴含了丰厚的跨时代潜质。采访人站在后新时期、全球化立场所欲知的问题，有时甚至是受访人从未想过，更绝不可能在回忆文章中自觉提及的盲点。猛然被受访人问起，第一反应是惊愕，然后是没有组织的思绪。

比如，我在研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时发现，在共产党官方电影机构制作的战争新闻纪录片中，罕见伤亡、焚烧、流离失所等惨烈的画面。是摄影师没有拍摄到？不愿拍摄？还是剪辑师、导演弃之不用？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选择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党派创作观念。与之对比，国民党制作的战争类新闻片，则毫不避讳此类画面。尤其《日军的暴行》一片中，有些画面惨不忍睹，令人食无味、寝不安。

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他们总是清晰地记得在战争中如何拍摄到某一个珍贵画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闪过念头，为何不将伤亡拍摄入镜。从他们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从来就不构成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以我采访程默的摘录为例：

黎：拍摄战争场面，有没有看到身边的同志……？

程：有。打死的人地上都是，半伤不死的多得很呐，断胳膊少腿的有，哭的叫的也有，什么都有，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

黎：奇怪的是，我们战争纪录片里却没有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你们就没有拍过这些躺在地上受伤或者死难的人？

程：对，没有拍。

黎：为什么不拍呢？

程：没有必要的东西就不要拍，这是反教育。拍摄的东西应该对教育有一定的意义。

黎：什么是有必要拍的东西？什么是反教育的东西？

程：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很惨的东西，就没有必要拍。

黎：是您于心不忍，还是有什么规定？

程：就是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

采访人欲层层追问，受访人却无意作答。这组访谈信息并不完整，叙事关系不清晰，按一般的文献标准来看，是一段不具收藏价值的对话。但，口述史料的特性恰恰就在零散的对话中凸显出来。分析受访人的言语碎片，再整合其他受访人对同一个问题支离破碎的讲述。上述的疑问可以解释为，由于受宣传上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感染，对伤亡保持平常心，不拍摄入镜，是摄影师们在政治语境下的自觉美学选择。石益明在口述访谈中提到，战地摄影师们见面打招呼的惯用语是“你还没有光荣啊？”咒死的会话交际，向来为国人之大忌，只有在特殊的年代才能理解乐观的含义。可以推测，被意识形态反复提倡的、外溢的乐观主义情绪，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感染的形式传递到纪录片美学中，令创作者从内心深处自觉将乐观传染给观众，将悲观挡在镜头之外。

不将伤亡入镜，是惯性价值判断后的下意识行动，在摄影师的记忆中并不如东北战役、淮海战役、开国大典、朝鲜战场等重大事件那样值得记忆。人们总是有一套由自身性格与社会意识共塑的价值判断体系，它决定着记忆存储的方式。越为这套价值体系肯定的东西，记忆越牢固，反之则走向遗忘。受访人固有的价值判断体系是私密的、个体的、且受限于时代，“人们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便存在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

(27) 同(25)，第128页。

(28) 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象”。<sup>(29)</sup>

口述对话的目的不仅是要调出记忆，更要力求用当下的声音将被个人评价体系所抛弃到深渊的习惯、被动性思维、价值弃儿等打捞出来。也就是陈墨所言，要进行心灵考古，打开“乔哈里窗口”的第四扇窗，获取采访人与受访人都不知道的信息。<sup>(30)</sup>戴维·赫尼基肯定口述“借助现在摆脱过去束缚”的能力，“在那些以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为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基础的社会中（当然，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口述能借助现在摆脱过去的束缚，因为它使对过去面貌的记忆——如以往统治者的活动及他们前后的更替——符合不断变化的自我形象（self images）”。<sup>(31)</sup>

## 2. 瞬间修辞，保持最本真的记忆。

修辞学大家陈望道指出，语辞的形成有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裁剪配置；三、写作发表。”<sup>(32)</sup>他在文中说明上述原则适用于“笔墨与唇舌”，其实针对的主要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中的演讲。对笔墨与演说而言，上述三阶段当然必不可少，但在口述中，三阶段则有不同的变化：

一、搜集材料。基本所有的受访人都会认真阅读采访提纲，但不是所有人都会为采访进行有心的材料收集。一些老人行动不便、独居不出，一些老人从来就没有收集史料的习惯。对于他们而言，记忆就是材料，唤醒记忆就是收集材料。

二、裁剪配置。虽然有采访提纲引导受访人进行逻辑叙事，但口述言语毋需按章节行事，加之口述采访无时间限制，受访人基本上不需做太多的裁剪配置。

三、写作发表。录音录像的成果离发表要求还去之甚远，倒是用“写作”（若将口语发出比为写作的话）——“发表”（采访人日后整理出版稿）较为稳妥。“写作”瞬间完成，修辞甚少。“发表”的修辞是另一番学问，采访结束以后的事情。

从三阶段看，书面文献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修辞学推敲，将文字、篇章、逻辑装潢得更精美。口述历史从收集材料、裁剪配置到口语发出，几乎就是瞬间的事。英国学者塞缪尔（Raphael Samuel）认为“口述证据是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其原因就是“口述史料特别自然，未加修饰……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sup>(33)</sup>“未加修饰”有些夸张，“瞬间修辞”却是事实。

演说、公共讲课、新闻发布一人唱主角，有充足的时间精心准备，且有着明确的目的与针对性，是站在“我”的角度，要把“我”的观点成功地输送给对方，修辞学极其重要。口述的讲述者没有一定要说服对方的功利目的，只需要输出记忆即可。口述采访人会使用预防、建立友谊关系、选择家居环境、对话平实、从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开始谈话

等种种努力引导受访人减少修饰。

因此，口述是记忆最迅捷、最直接的表述方式，掩饰更少，真情更多，因而也更有价。书面文献深思熟虑，修辞学往往掺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修辞可以通过巧妙的话语编织而赋予意识形态自然化的效果，在无意识中使自己的声音侵入人们毫无防备的观念之中，如此，修辞便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试图消弭存在差异的不同意见”。<sup>(34)</sup>

尤其在中国，意识形态至尊，人事关系微妙，人性一敛再敛，落笔谨慎再谨慎。我们所采访的电影界人士，曾无数次接受采访，有着丰富面对媒体的经验。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说几分留几分，他们被自己的戒备心裹得严严实实。偏偏有一些话在口述中没来得及过思想检查关，一顺嘴就漏出去了，要让它落实到文字出版物上，采访人是万万不干的。吴迪这样描述他的一次经历：

在口述采访中一位老导演对他的录音整理稿不断地删改，每一次都隐去了一些人的名字，删去了某些敏感词汇和特指性事件。以至于当他跟我发誓，再也不改一字的时候，我仍旧嘱咐编辑部：“你们先放一放，别排版，老先生可能还要改”。果然，当晚，老先生又来电话，要求将某人的姓氏的拼音再改一下。以免人家猜出来其所指。而这个人正是这位老导演最痛恨的主儿。在访谈过程中，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此人。

这种从清晰退向模糊，从公开退向隐匿，从直面退到回避的情况，在口述史工作中是屡见不鲜的。<sup>(35)</sup>

可见，“清晰”、“公开”、“直面”是他们在口述中的一种状态，“模糊”、“隐匿”、“回避”是他们在出版物中的另一种状态。一般人对于出版物更紧张，口述中的率真直言容易被在出版时删除。万幸，它们还尽数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这就是口述对历史的一种补充。

另一位老前辈与此不同，他不是担心口述出版文本太露，而是觉得太没有修辞。这位大名鼎鼎的演员，对待口述就如同无数次接受媒体采访那样，

<sup>(29)</sup> 同(17)，第79页。

<sup>(30)</sup> 陈墨《“心灵考古”：口述历史的方法与模式探索》，《当代电影》2010年第7期，第41页。乔哈里窗口（Johari Window）分四层：1. 公开窗口：自我和他人已知的，是公开的信息窗口；2. 秘密窗口：自我已知，但他人未知，是秘密的信息窗口；3. 盲目窗口：自我未知，但他人已知，是（本人）盲目的信息窗口；4. 潜在窗口：自我和他人未知，是潜在的信息窗口。

<sup>(31)</sup> 戴维·赫尼基《“书写病”：新文化圈子中干达人与尼奥罗人的王家世系》，米勒《非洲的过去如是说》。转引自陈献光《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第79页。

<sup>(32)</sup>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sup>(33)</sup> Raphael Samuel, *Myth and History: First Reading* [J]. *Oral History*, 1988, p15. 转引自陈献光《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第79页。

<sup>(34)</sup> 谭善明《论话语修辞中审美与认知的张力》，《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页。

<sup>(35)</sup> 启之《口述历史研究：受访者的心理》，《电影文学》2010年第21期，第154—155页。

很配合，也签署了授权协议。出版前，采访人将整理稿件递交他手上请其审阅。没想到，他非常不满，甚至有些恼怒，执意撤稿。老人情绪比较激动，我们也怕伤他肝火，只好撤稿。后来辗转得知，受访人恼怒的原因大概是，报道他的文章数不胜数，均文采飞扬。他已经习惯于被修饰华丽的行文萦绕，可惜，瞬间修辞的口语肯定不如书面文字雕章镂句。

这个案例从反方向证明，在习惯了修辞的中国人那里，不修辞是多么独特、别扭和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口述历史在打破修辞、还原本真上所做的探索又是多么有中国特色的意义。

### 3. 潜文本，等待情境下解码，为历史提供丰富的想象力

如前所述，口述历史对话具有“瞬间修辞”的特性。“瞬间修辞”不等同于不修辞，而是更多地转向声调、声量、重复、停顿、沉默、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副语言”。<sup>(36)</sup> 这些“副语言”的修辞，需要采访人与解读者进行情境下修复，才能获知其潜在信息。语言学中将之称为“潜语言”。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在话语讲述中，倾听者的在场对于填充讲述空白有积极作用，“必须让倾听者能够用自己的观念世界和零碎知识来给这些故事添漏补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掌握别人口述的故事，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故事”。<sup>(37)</sup>

语用学家认为，语境是口语的解释因子。这些丰富的“潜语言”需要在情境下读解，才有滋有味。某些话语的断裂，意义的真空，需要解码者在语境下进行修复与填充。这不仅让对话充满思想的密度，也为历史提供丰富的想象力。

在口述对话中，还有一种等待修复的现象——偏离。零度修辞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只达意，不传情，不加修饰。偏离分为正偏离与负偏离，正偏离指修饰的正向努力，负偏离指修饰不当引起的意义曲解，有语音偏离、语义偏离、篇章偏离、话题偏离等。<sup>(38)</sup> 口述历史对话中源于口误与记忆不实的负偏离会在日后的文本整理中得到部分修复。那些为了遮蔽难言之隐，故意使用的负偏离，有目的地“辞不达意”，则需要采访人在情景下进行积极读解。

比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组同事李镇谈到，他在采访中常常发现受访人跑题，过一会儿又跑题，慢慢地他琢磨出，跑题的部分恰恰是受访人憋了好多年特别想说又不便直说的话，绕着弯子要让人猜。我也不止一次碰到类似的例子，在采访S先生时，我每次问及“文革”的情况，他都说：“厂里的情况不清楚，我反正被打成“三名三高”，具体情况你去问L，你不是跟他挺熟吗？”我说等采访L时，我自然会问他，但现在想知道您的回忆。回答还是那句话——“问L”。等友谊关系慢慢建立起来，我委婉地告诉S先生，我跟L也不是那么熟，只是那天在路上碰到，他说可以顺带陪我上您家，因为他家就在您家楼上。

知道我和L的这层非亲密关系后，他才告诉我，“文革”时期，L很积极，参加了造反派，带头喊口号批他，所以L知道的情况一定多。“问L”有两种潜信息，一、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对“文革”不知情。二、L是“文革”的活跃分子，他批过我至今也没有道过歉，他应该通过采访表明自己的历史态度。

吴迪将口述历史分为两个文本：受访人同意公开的“显文本”与拒绝公开的“潜文本”。他认为两种文本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时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思想情感的异动，以及时政观念的更新改变”都是决定“潜”向“显”单向变化的因素。<sup>(39)</sup>

本文中所述的潜语言与主观负偏离都可以看作“潜文本”中的特殊部分，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将是潜文本中最早最易向“显文本”过渡的“准显文本”。口述采访人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就是刻不容缓地将这部分变为“显文本”，不能消极地等待时间的流逝。为此，他们要做的是：细心倾听弦外之音；仔细观察对方欲言又止的瞬间表情；积极打通信息链，通过外围探知隐情诱因；适时以合适的方式引导受访人发“隐”；不失时机地追问；适当地拉长采访周期，将采访关系建立为友谊关系；将敏感的问题留到最后。

## 口述与历史撰写

综上所述，口述由于具备对话“过去——现在——未来”的属性，成为一个多声部的、复调的、对话的史料，有力地填充了历史真空，为历史留下充满细节的朴素的记忆，并积极调动参与者与阅史者解码的想象力，唤起人们对原文本创生的欲望。这些都将成为历史撰写的深度开辟道路。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原始资料代表过去的声音，研究者代表现在的声音，撰写的过程就是以撰史者为代表的“现在”与以史料为代表的“过去”之间的对话。对于撰史者而言，使用口述与借助一般的独白文献不同，他可以进行“现在”与“过去——当下——未来”的双重对话，让“现在”与“过去”、“现在”与采访“当下”、“现在”与“未来”发生复杂而多向的联动。

口述中真实的讲述对撰史的帮助毋庸置疑，就连不真实的“伪”、“误”、“虚”、“隐”在这联动中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囿于篇幅，关于口述与历史撰写的关系笔者另择文再议。

(黎煜，副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00082)

(36) 参见李镇《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当代电影》2011年第9期，第102页。

(37)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38) 关于修辞学的零度与偏离概念，见李幼燕《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39) 同(35)，第155页。